

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上）

余英时文集 第七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上）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余英时文集 第七卷

◎ 沈志佳 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余英时文集. 第7卷, 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 上 / 余英时著.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3

ISBN 7-5633-5949-4

I. 余… II. 余… III. ①余英时—文集②文化—中国—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141168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育才路15号 邮政编码: 541004)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肖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广西桂林市临桂县金山路168号 邮政编码: 541100)

开本: 787 mm × 1 092 mm 1/16

印张: 19.5 字数: 290千字

2006年3月第1版 2006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 001~7 000册 定价: 32.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余英时

安徽潜山人，1930年生于天津。1950年至1955年就读于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师从钱穆先生。1956年至1961年就读于哈佛大学，师从杨联陞先生，获博士学位。曾任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现居美国。

著有《汉代中外经济交通》、《历史与思想》、《史学与传统》、《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历史人物与文化危机》、《士与中国文化》、《方以智晚节考》、《论戴震与章学诚》、《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兼论他的学术精神与晚年心境》、《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现代儒学论》等。



余英时文集

第一卷 史学、史家与时代

第二卷 中国思想传统及其现代变迁

第三卷 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

第四卷 中国知识人之史的考察

第五卷 现代学人与学术

第六卷 民主制度与近代文明

第七卷 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上)

第八卷 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下)

第九卷 历史人物考辨

第十卷 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

责任编辑 ◎ 汤文辉

装帧设计 ◎ 张 明

陆润彪

十卷本《文集》序

《余英时文集》一至四卷在2004年刊行以后，沈志佳博士又继续搜集了我的其他文字，择其可以与大陆读者见面的，编成第五至第十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不辞烦难，在条件允许的范围之内，续刊这六卷新的《文集》，其敬业的精神是令人感动的。让我再一次对沈博士和出版社表示我的最诚挚的感谢。

我的专业是历史学研究，所以这六卷所收的论文仍然贯穿着史学的观点。但是就所涉及的范围而言，这六卷则比前四卷要广阔得多。整体地说，在我的思考和研究中，中国传统文化怎样在西方现代文化挑战之下重新建立自己的现代身份(modern identity)，一直是重点之一。这当然是清末，特别是五四以来，中国知识人的共同问题，然而始终得不到明确的答案。我也不过是千千万万寻找答案者之一而已，这六卷新文集中保存了一些我的寻找的印迹。

后六卷与前四卷一样，也包括了早期到近期的文字。最近的包括一篇未发表过的新稿(讨论钱谦益的“诗史”观念，收在第九卷)，最早的则是我在香港新亚书院求学时期的“少作”(收在第六卷和第七卷)。这里只想对这些“少作”略作交代。我受了五四思潮的影响，虽然已决定投入中国史的专业，

但对于西方近代的文化史和思想史同样抱着浓厚的兴趣。我当时已不能接受任何抽象的历史公式,更不承认西方史的阶段划分可以为中国史研究提供典型的模式。然而我深信西方的历史与思想不失为一个重要的参照系统,使我更易于在比较的观点下探索中国文化和历史的特性。同时,对于五四时代所接受的西方近代文化主流中的一些基本价值,如容忍、理性、自由、平等、民主、法制、人权等,我也抱着肯定的态度。这些价值,当时也被公认为普世性的,1948年联合国的《人权宣言》便是明证。基于这一认识,我在1950年至1955年这几年间,曾努力阅读这方面的西文著作。《文集》卷六、卷七所收的“少作”便是在这一心态下写成的。

这些“少作”只是我早年学习的纪录,久已置于高阁。但1983年,在台北友人一再鼓励之下,我觉得盛情难却,曾由汉新出版社重印过一次。沈志佳博士这次提议将它们收入《文集》,我本来是很犹豫的。但是她认为这些“少作”毕竟代表了我写作生涯中的一个阶段,从《文集》编辑的角度说,仍是一个不宜缺少的环节。我终于接受了她的判断。这次印行,我自己并没有时间做任何修订。不过出版社方面根据既定的编辑原则,曾作了一些必要的处理,基本上仍是尊重原作的,仅仅减少了一些文句而无所增改。我很感谢出版社的苦心与好意。对于西方史的参照功能和起源于西方但已成为普世性的现代价值,我至今仍然深信不疑。这也是我让这些“少作”再度刊布的唯一理由。

余英时

2006年元旦

目 录

余英时文集

第七卷 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上）

1	《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自序
3	尝侨居是山，不忍见耳——谈我的“中国情怀”
9	到思维之路
11	《到思维之路》再版自序
13	《到思维之路》自序
16	学而思 思而学
19	变与常
22	合情合理 合理合情
25	吾道一以贯之？
28	主义与问题
31	主观、客观与思想
34	理未易察！
37	解开心物之争的死结

39	解“执”
42	求其放心
45	为有源头活水来
47	思想的广度与深度
50	从心灵到思想
52	肯定我们的独立思想!
54	思想的分与合
56	远在天边 近在眼前
59	知识·思想·信仰
62	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65	思维与思维方法
68	思想的继往与开来
71	知而不行,只是未知!

77	文明论衡
79	《文明论衡》序
81	文明与野蛮
92	论进步
107	论自觉
121	论传统
134	论文化整体
149	文化评论
151	五四文化精神的反省与检讨——兼论今后文化运动的方向
162	五四——一个未完成的文化运动
167	文艺复兴乎？启蒙运动乎？——一个史学家对五四运动的反思
189	我对中国问题的反省
201	中国社会重建的一点检讨

208	“文明”与“文化”释名
213	论文化超越
227	试论中国文化的重建问题
238	自我的失落与重建——中国现代的意义危机
243	文化的病态与复健 ——刘笑敢《两极化与分寸感》序
250	文化危机与趣味取向
259	中国现代的文化危机与民族认同
280	谈中国当前的文化认同问题
284	美国华侨与中国文化
293	国家观念与民族意识

《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自序

本书选收了我近年来讨论文化和思想问题的一部分文字。这些文字先后发表在台北和香港的报刊上,特别是《中国时报》、《联合报》、《当代》和《明报月刊》。趁这次汇集成书的机会,我对其中几篇略作了一些增删,但基本论旨并无改变。我很感谢各报刊的主编朋友们,如果不是他们的热心督促,这些文字是不可能写成的。

本书定名为《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这一点也许应该略加说明。1985年6月,董桥先生为《明报月刊》计划了一个“中国的情怀”专页,坚邀我参加一份,因此我便写了那篇《常侨居是山,不忍见耳》,此文现收入本书之中。但是全书涉及“中国情怀”的仅此一篇,为什么这四个字竟成为书名的一部分呢?这是因为本书所收的文化评论的文字都是在“中国情怀”之下写成的。我可以毫不迟疑地说,如果不是由于我的“中国情怀”在暗中作祟,这部书是不可能产生的。从前人都说,陶渊明的诗中,篇篇有酒,我这部集子中则篇篇都有“中国情怀”。

所谓“中国情怀”其实便是一种中国文化的情结。此情古人早已有之。李陵《答苏武书》所谓“远托异国,昔人所悲;望风怀想,能不依依”便已道出此中症结。李书虽伪,其情则绝不能伪。像我这样早年受中国文化陶冶的

人,是不可能完全忘情于中国的。但是这只是文化上不能忘情,与现实政治之间并无必然的关系。本书所收文字中虽间有关涉政治的部分,然而其基本立场仍是文化的。文化包含了政治,同时也超越现实政治,这是本书的一个中心论点。

我是在1950年离开中国大陆来到香港的,然后再移居到美国,以现实生活而言,我不但早已与大陆脱了节,而且和台湾更是向无渊源。70年代以后,我在学术思想上开始和台湾发生了较为密切的联系,但是我在台湾的访问从来没有超过两个月。从文化观点说,大陆、台湾、香港在我心中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如果说我的学术工作和台湾、香港关系较深,而和大陆的距离较远,那完全是由于政治现实造成的,在过去三四十年间,我的“中国情怀”只有去台湾和香港两地才有自由表达的机会。今天的情况已大有不同,“远托异国”的人也可以和大陆的学术文化界发生有实质意义的交流。这当然更增强了我们关于文化可以超越政治的信念。但是最后我愿意强调一点:本书各篇文字都是以整个文化中国为对象,而我个人所关怀的也从来便是整体中国文化的前景。因政治现实而产生的地域界线在本书中是不存在的。

余英时

1988年10月10日于普林斯顿

尝侨居是山,不忍见耳

——谈我的“中国情怀”

《明报月刊》要出关于“中国的情怀”专页,承编者雅意,让我参加一份。我很喜欢“中国的情怀”这个动人的名称。但是什么是“中国的情怀”呢?仔细一想却不好回答,因为这不是可以通过形式化、概念化的途径来解决的知识性的问题。怀疑主义的哲学家甚至还可以问:究竟有没有“中国的情怀”呢?“中国的情怀”和其他各国的情怀到底有什么根本的差别呢?我不想这样“煮鹤焚琴”地煞风景。我的直觉告诉我,“中国的情怀”确实是存在的——它存在于每一个受过中国文化熏陶的人的身上。但是这种“情怀”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身上却有不同的表现,因此又是无从“一言以蔽之”的。“情怀”是属于整体感受方面的事,这也许便是佛经上所说的“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吧!

屈指算来,我住在美国的时间早已超过住在中国的时间,而且照现在流行的说法,我也只能自称“美籍华裔”。但是惭愧得很,从下意识到显意识,我至今还觉得自己是“中国人”。后来我逐渐明白了:原来“中国人”自始即是一个文化概念,不是政治概念。而我的“文化认同”始终是中国,不是西方,虽然我对西方文化优美的一面也十分欣赏。

1978年10月,我第一次回到中国大陆,离出国的时间已整整29年了。

从东京飞北京那几个小时,心情真是有说不出的激动。那正是我的“中国的情怀”全部流露的时刻。但是飞机降落在北京西郊,萦回在我脑际的却是丁令威化鹤归来的神话,那时我才真正体味到“城郭如故人民非”的意思了。我们是代表美国官方的学术访问团体,接待我们的当然也是中国官方的学术界。接待的热情和诚恳是令人感动的,可以说做到了“有求必应”的地步。但是既属官方交往,“官腔官话”彼此都是无法避免的。这种情况对我来说,却真感到有些“难以为怀”了。后来承接待人员的好意,让我有充分的机会和家人亲友相聚,听到了无数惊心动魄的故事,当然也更加深了化鹤归来的感受。

这次我们的代表团在中国先后旅行了整整一个月。我们的任务是访问汉代遗迹,所以足迹所至大致以“秦时明月汉时关”为主,在洛阳、西安、兰州、敦煌、昆明、成都等地各停留了两三天。在旅途中,我特别察觉到我自己的心情与同行的美国朋友迥然不同。他们所全神贯注的是怎样通过这次访问来改进他们的专题研究:或证实或修正他们已有的“工作假设”。中国对于他们只是一个客观研究的对象。我虽然也有此客观的一面,但是我的心情主要是一个千载后的子孙来凭吊祖先所踏过的足迹。从西安到敦煌这一段火车行程尤其使我神游于千载之上,时时体念到汉唐时代的祖先怎样开拓了这样一个规模宏大的国家,创造了这样一个绵延不绝的文化。我的心情不但与美国同行者完全不同,甚至和伴随我们的中国朋友也截然异趣。这是因为他们的历史意识已相当彻底地政治化了。他们透视中国史所运用的一些概念范畴,如“奴隶”、“封建”、“阶级斗争”等,对我而言是非常陌生的。例如在西安霍去病墓前,我们看到著名的“马踏匈奴”的西汉石雕,但是这个石雕的正式名称却变成了“马踏匈奴奴隶主”。我们再三地端详,始终无法看出马足下那个模糊不清的匈奴具有何种社会身份。这个标签也许和大陆的“民族政策”有关,自有其不得已的苦衷。但是这毕竟是歪曲历史来迁就政治现实。“马踏匈奴奴隶主”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例子,但观微却可以知著。

二十年前我曾研究过汉代的中外经济交通,河西走廊正是我的研究重点之一。但当年只是纸上谈兵,对这条“丝路”并没有亲切的认识。这次从西安经兰州去敦煌才使我了解祖先创业的艰难。这是程伊川所谓的“真

知”。在兰州至敦煌的途中,我有《河西走廊口占》一诗。诗曰:

昨发长安驿,车行逼远荒。两山初染白,一水激流黄。
开塞思炎漠,营边想盛唐。时平人访古,明日到敦煌。

诗不足道,但可从其中看出一点我的“中国情怀”。

从敦煌回来,要在清晨三时左右乘汽车赶到柳原。残月在天,在横跨戈壁的途上先后遇到多起骆驼车向敦煌的方向进行,也许是赶早市的村民吧。我当时不禁想到:这岂不是两千年前此地中国人的生活写照吗?除了我们乘的汽车,两千年来的敦煌究竟还有些什么别的变化呢?至少以这个地区而言,汉代的敦煌是比今天要繁荣热闹得多了。我的“中国情怀”禁不住又发作了,这也有诗为证:

一弯残月渡流沙,访古归来兴倍赊。
留得乡音蟠却鬓,不知何处是吾家。

限于访问团的性质,我们的行程基本上不包括我少年时代所熟悉的江南。其中虽预计在南京停留一天,访问紫金山的天文台,但又因班机延误而临时取消了。以我们的学术任务而言,此行可谓了无遗憾,即以开阔眼界而言,此行也收获至丰。但是失去重到江南的唯一机会,对我个人而言,则实不胜其惆怅。所以在离开北京的前夕,我曾写下这样几句诗:

凤泊鸾飘廿九霜,如何未老便还乡。
此行看遍边关月,不见江南总断肠。

这显然又是我的“中国情怀”在那里作祟了。

尽管 29 年后化鹤归来,发现“城郭如故人民非”,我的“中国情怀”不但未曾稍减,似乎反而与日俱增。正因如此,我才不能忘情于故国,而往往要以世外闲人的身份,与人话国事,说些于己无益而又极讨人嫌的废话。我曾屡次自戒,而终不能绝。周亮工《因树屋书影》卷二记载了他的朋友所说的一

段佛经上的故事。这个故事说：

昔有鸚鵡飞集他山……山中大火，鸚鵡遥见，入水濡羽，飞而洒之。天神言：“汝虽有志意，何足云也？”对曰：“尝侨居是山，不忍见耳！”天神嘉感，即为灭火。

周亮工的朋友接着发感慨说：

余亦鸚鵡翼间水耳，安知不感动天神，为余灭火耶！

这个美丽的故事虽出于印度，但显然已中国化了。“知其不可而为之”，“明其道不计其功”，“只问耕耘，不问收获”，这些话和上面那个神话在精神上不是完全一致的吗？不过不及神话那样生动感人罢了。大概“尝侨居是山，不忍见耳”几个字可以说明我在这一方面的“中国情怀”吧！

不但对中国大陆如此，对香港我也一样有“侨居是山，不忍见耳”的情感。最近为文涉及香港的文化问题，责之深也正由于爱之切（见《明报月刊》1985年4月号）。我先后在香港侨居了六七年，何忍见其一旦毁于大火。但在抱有狭义的地方观念的读者看来，便不免要疑心我看不起“香港文化”了。我这只飞集他山的鸚鵡竟因此变成了“能言鸚鵡毒于蛇”的鸚鵡，岂不冤哉！

最近看到我的朋友刘绍铭所写的一篇关于大陆“游学生”文学的文章，其中引了王蒙《相见时难》中的一段话，颇耐人寻味。王蒙说：

一个几十年来没有对祖国、对祖国的多难的人民尽过一点义务的“美籍华人”，却有资格来向他提出问题吗？……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你芝加哥的和纽约的、旧金山和洛杉矶的美籍华人都加在一起，能懂得这两句诗的含义吗？（《明报月刊》1985年4月号，69页）

这样义正辞严的话，像我这个“美籍华人”读来安能不羞愧欲死。不过羞愧之余，我也发生了一个无法解答的疑问：为什么换了“新天”的今天，忽然产生了这许多“美籍华人”呢？王蒙文中的“美籍华人”显然都是1949年以